

痴心华夏一统的炎黄赤子——李劲祥

孙孝丰 李兴让

2002年8月10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人、华侨代表，在北美名城芝加哥举行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300余位与会者群情激昂，纷纷声讨陈水扁分裂祖国的谬论和罪行。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民间代表，有理有据，慷慨陈词，发表了《与时俱进，全力推进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演讲，博得全场热烈掌声，他就是北京华世通实业公司总经理、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副会长、本次大会主席团成员兼副秘书长的李劲祥先生。几年来，李劲祥分别以特邀顾问、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等身份，先后应邀赴柏林、华盛顿、东京、悉尼和圣保罗等地参加全球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并作为中国大陆首席民间代表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冒着危险参加全球华人和平统一访问团到纽约访问。由于李劲祥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做出的积极贡献，2000年11月26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全球华人反独促统大会上，荣获和平统一奖。2001年9月30日他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朱镕基总理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2周年庆典宴会。在此以前，他和夫人（中国致公党湖南省直属机关副主委）曹素荣女士、女儿李军等受到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面对殊遇，李劲祥心安理得。而与他患难与共，历尽坎坷的结发妻子却心潮澎湃，浮想联翩。自她16岁参军以来，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一幕幕涌现在眼前。从女兵到医师；从国家干

部到民营企业家；从共青团员到民主党派的省直机关领导成员；从靠缝书包糊口的贤妻良母到周游列国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而奔走呼号的社会活动分子……数不清的酸甜苦辣，使这位刚强而又温柔的铁女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迎接黎明

李劲祥 1937 年出生于河北冀东古城迁安，父亲在开滦煤矿当员工。他天资聪慧，以他高小毕业考试名列前茅的成绩，完全有把握考入名牌中学，将来升大学。但因交不起学费，只好报考河北省立滦县师范初师班。滦师是戊戌维新时期成立的名牌学府。虽然当时明文规定师范生毕业后不准考大学，只能当“孩子王”——小教，但学校管吃管住，还发操衣和课本，广大贫寒学生，都争想进入这所名副其实的“食饭学校”。以致在当时普通中学生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滦师的考生录取率竟达到十里挑一。而刚满 12 岁的李劲祥却以优异成绩轻松地跃入录取圈。

这时正值辽沈战役，为阻止四野大军入关西进，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急令炸毁距滦师两公里的滦河大桥，将关内军队迅速向平津收缩。在学校当局诱胁下，滦师绝大多数师生携带学校流动资产和粮食，随“国军”西撤，企图进入北平。而刘乃林、张允中、赵禹中等十几位进步学生，冒着断粮和遭迫害的危险，展开了反裹胁、反搬迁的护校斗争。李劲祥这位刚入校的“娃娃”，在中师班同学李兴让、刘宗仁的帮助下，也积极投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十几个同学每天只能吃两顿用脸盆煮的秫米稀粥，加点碱和盐当菜。还要轮流捡柴、挑水、煮饭。李劲祥不但不以为苦，反而觉得很有趣，他整天欢天喜地的参加“抢米”、巡逻、放哨、贴标语、扭秧歌、慰问入关大军等活动，就连过年也顾不上回家看看近在咫尺日夜为他担心的父母。

投笔南征

1949年初，人民政权接管了学校，西撤的师生也陆续返校复课。这时正是百万大军待命渡江的紧张时刻。一日千里的革命形势，需要大批地方干部随南下大军去开辟新区。根据党中央和华北局的紧急指示，冀东特区党委直接派出以老干部王卓章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滦县县委，发动在校学生参军南下。李劲祥闻风而动，立即到工作组驻地嚷着要参军南下。

由于当时形势发展太快，新区情况复杂，冀东特区党委对招收南下干部的条件要求较严。不但对政治思想品质和历史社会关系等要严格审查，而且对工作能力、文化程度等也都有具体要求。目的是进入新区后，每个南下干部都能独挡一面、独立工作。因而年龄要求一般在18岁以上，并要进行文化、政治考试，比最低年龄线小5岁的李劲祥，很自然地被王卓章“劝”了回来。他碰了钉子后，又缠着当时最早脱产参加特区招干工作组与王卓章、侯恩等老同志一起住在县委并分工到滦师就地招干的李兴让不放。他软磨硬泡地非要南下不可。在护校斗争中，李兴让早就对这位调皮捣蛋却机智、勇敢、爱憎分明的小兄弟存有特殊感情，就私自让他进入考场，并事先把试题中有关政治理论和目前形势等方面的答案指点给他。好在小李一点就通，加上他祖传的书法又快又好，不一会，就第一个交卷。王卓章在讲台上仔细看过这份简明、流利且字迹工整的答卷，不由暗自称奇。当碰头审查录取名单时，王卓章温和地批评李兴让“先斩后奏”。李兴让极力辩解，说小李出身好，机智、勇敢、热情高，是个难得的好苗子。这时汇文中学的张永盛、县立中学的王永安，也先后被提拔到招干工作组，住进了县委，他们都帮着向组长说情。王卓章同志严肃地说：“我若不同意李劲祥南下的话，早在考场就赶他走了。在老区提拔一个脱产干部，都要经过长期慎重的考验和

考查，还要按照组织手续集体研究报县委批准。你们才吃了几天‘官饭’，就这样马马虎虎，以后到新区工作是要犯大错误的。”说着翻开发给大家的用土纸订的小笔记本的扉页，对着石印的毛主席亲笔题词，郑重地念起来：“大军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李兴让脸上火辣辣地，无比愧疚。这是入伍后第一次感受到老同志对自己的关怀、教育的温暖。从此牢记谦虚谨慎和遵守组织纪律的重要性。

几天后，李劲祥的名字出现在《冀东日报》的南下学生名单中，他兴高采烈地随几十位新战友到 80 里外的开平区石庄集训。编入冀东南下工作总队六大队六中队。小李个头瘦小，新发的土布军装裤腿和袖筒都长一大截。女同志替他剪短缝好，但上衣又长又大像风衣一样，则不能改，因为两个大口袋是区分指、战员的重要标志。他只好用腰带扎得紧紧的。清早他抢着挑水，扁担钩上水桶比肩膀还高，他只好去抢又粗又大比他头顶还高的竹扫帚，每天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受到中队长李斌的表扬。经过短暂的理论、政策学习和军事训练，冀东 2000 余名南下干部于 1949 年 5 月随四野后续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于当年 6 月下旬到达河南新郑县花园口，与山西晋中地区、河北冀南地区和山东胶东地区等近万名南下队伍胜利会师，改编为四野江南支队四大队（代号 105 部），下属十一个中队。当时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地委的编制，由专员任大队长，地委书记任政委；中队长和政委分别由县长、县委书记担任。每个中队又分若干班，正副班长由区委书记和区长担任。李劲祥等 30 多个“学生队”分到新化中队。这个中队主要成员是以县委书记尹之席为首的来自冀南地区的老干部。学生队队长陈尤然是位刚满 20 岁的老八路。他对这位与自己当年相似的人小胆大、天真调皮的小李子，格外爱护关怀。陈尤然既当队长又当老师又当保姆，晚上替他盖被、捉虱子，行军时边走边讲革命理论和历史，还手把手地教他手枪瞄

准、投弹、野营、缝补等等。李劲祥的理解力、记忆力和进取心都特别强，几乎过目成诵，一学就会。

大圳剿匪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105部在大队长魏国元、政委夏如爱的率领下迅即进长沙县协助新建县委完成清匪、征粮和支前任务后于9月初进驻长沙市集训待命。正值西进的二野和南下的四野大军在长沙举行会师大会，陈赓、黄克诚和肖劲光等首长都亲自参加。为了维持秩序和保证会场安全，省委指示从南下队伍中抽一些政治可靠、机智勇敢的年青干部穿便衣混在群众中做保卫工作，省委警卫连长一眼看中了李劲祥这个“毛孩子”，并指名把他调到省委机关，安排到黄克诚将军身边当通讯员。幼稚而倔强的李劲祥，却念念不忘“当兵不打仗，等于瞎嚷嚷”。一心想到剿匪第一线。经他再三要求，1949年10月他又回到邵阳地委，在办公室当干事，由秘书仲沂同志培养。这时剿匪、反霸和支援前线等工作都非常紧张，李劲祥找到来地委开会的新化县委书记尹之席。尹书记没法说服这位喋喋不休却又条条是道的娃娃，只好请求地委组织部长白连城批准，将小李带到新化县，安排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办公室主任正是带他一路南下的老上司陈尤然。陈要他分管机要文件、档案和会议纪录，与彭洪宾、齐英、焦威、刘风云等老同志收集、了解各区剿匪情况和工作进度，及时向领导反映并写出简报。李劲祥很快学会了刻钢板，他油印的简报又快又好。当时是供给制，几乎餐餐是糙米加白菜、萝卜。13岁的李劲祥和老同志们一样，经常在煤油灯下通宵达旦地赶写材料，刻印简报。多次受到县委领导的表扬。

1950年春节前后，正是匪情猖獗之时，李劲祥又摩拳擦掌地要去剿匪第一线。经领导研究决定让他随县委宣传部宋名唐老同志到六区参加剿匪。陈尤然同志专门给他加配一支当时令人羨

慕的小卡宾和一百发子弹；还送他一支需一年多的全部津贴费才能买到的钢笔。当时“干部有三宝——手枪、钢笔、表”。李劲祥神气十足地说：“我有两件‘宝’了。他穿着草鞋，冒着刺骨的风雪走了60多里崎岖山路，傍晚才到达六区政府。不顾脚上打起血泡，第二天天刚亮，即与区委平立群同志和一个排的解放军到新化与安化交界的大圳乡投入战斗。晚上，他们被土匪围困在保长家中，情况十分紧急。在宋名唐和平立群同志的指挥下，小李冲锋在前，他一连甩出两颗手榴弹，端着卡宾枪边打边冲，在全排战士迎头痛击下，匪群弃尸溃逃，当场活捉六名俘虏。经过一年多的武力进剿，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瓦解，邵阳地区匪患基本肃清。1951年不满16岁的李劲祥先后调到县公安局和人民银行担任股长。为了培养深造，县委特地送他到湖南省行政学院学习。他又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并报考中国逻辑语言大学，系统地学习了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管理等知识。毕业后被统一分配到艰苦的新宁县崑山区担任了领导职务。

史无前例

1963年，根据中央指示，省委从全省各地抽调一批年青、政治可靠又有一定文化和理论水平的地、县、区级领导干部充实到新闻、宣传战线。李劲祥被调到湖南日报社当记者和编辑。这使他有条件常与省委主要领导接触。多年的阅历使他的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等都日趋成熟。正当他年近而立，雄心勃勃地为办成全国第一流的省级党报而贡献一生时，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爆发了。李劲祥这位年青共产党员，根清苗正、立场坚定，又有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在当时清三代、查九族的条件之下，选调省革委领导身边做秘书工作就非他莫属了。

1967年，他被任命为以华国锋为团长的湖南省文革运动赴

京汇报团的秘书处长，受到周总理的多次接见。周总理还与他交谈，说他的材料写得好，并与全团合影留念，使他深受鼓舞。在那发疯的年代，大红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竟宣扬大汉奸、叛徒周佛海的破烂：“信仰主义要达到迷信，服从领袖要达到盲从”；“接班人林副统帅”更叫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幼稚天真的李劲祥本着对党和领袖的朴实感情，热血沸腾地投入了这场“砸烂旧世界”的“最后的斗争”。

他拼命“紧跟”、竭力不折不扣地照最高指示办事。除了每天带头参加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活动外，还要深入基层，及时了解“阶级斗争新动向”。随时向首长汇报，写总结，为首长起草会议报告等等。经常忙得废寝忘食，只能在办公桌上打一下盹，冲一下冷水又干起来。然而现实的车轮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时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一忽儿某领导被大树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而红得发紫；一忽儿又被打成“大黑鬼”而批得臭不可闻。血气方刚的李劲祥，既不会看风，也不会使舵。在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翻船是不足为怪的。他“大革命”不到两年，却被关、管了十年多。在省委五七干校，他被编入一大队一中队。这个队有原省委书记、省委常委等30余名厅级以上的“专政对象”。与这些“黑干将”、“大叛徒”们比起来，李劲祥不过是条“小爬虫”。他自恃根清苗正，又受过周总理的表扬，不但不老老实实“认罪”，反而引经据典常“据理力争”，成了五七干校最顽固的“铁杆分子”。尽管事后首长为 him 挑了担子，“解脱”后分到省科委所属一个管理处当保管员，他仍努力工作，但十年浩劫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思想鸿沟和偏见，一时总难消除。开始他感到难于言状的委屈。经过平心静气地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献，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他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一场不该发动的历

史性错误，不管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如何，都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后果。因而应该摒弃个人恩怨和派性偏见，“团结一致向前看”。

既然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何必挤在臃肿不堪的机关里抢吃皇粮呢？

下海弄潮

这时，原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湖南日报》总编辑，曾任省委书记张平化秘书的梅永禄同志调任湖南省国土资源开发总公司总经理，老梅对李劲祥的才华和遭遇一向很赏识和同情，就不拘一格聘他为副总经理。恰好通过曹素荣的海外关系，日本中国贸易中心株式会社董事长外山义久也慕名聘请李劲祥当中国部投资局长。李劲祥不顾十年磨难造成的身心创伤，日以继夜地钻研和了解有关经济地理、金融、商法、企业管理等知识和国内外资源、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最新信息。经过可行性论证，很快为这两个公司分别做出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操作性很强的近期作业计划并经过相互考查、咨询和谈判，与国内外客商和地方政府达成了十几项技术开发意向和业务交易协议。然而 80 年代中期的中国大陆，计划经济的魔法仍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观念。林立的衙门、众多的主管婆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他到处烧香拜佛，还是没一个项目最终获得“恩准”。李劲祥不禁仰天长叹：“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何必寄人篱下，仰人鼻息？

他了解到国外贝壳和珍珠粉原料市场看好，于是东凑西借办起了自营长沙久祥贸易公司，并带着老婆孩子到湖区打捞贝壳。不管风雨烈日，蚊叮虫咬，他们坚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时一天只能吃上几个冷馒头，喝点冷水。为省钱就在汽车站的候车室过夜。经过反复摸索实践，终于掌握了打捞并按国际标准进行筛选和加工的技术。并对几十户渔民进行技术培训，实行分户捕捞，公司集中收购、加工和外销，既扩大了出口量，又增加了渔

民收入。除照章缴税、向单位交“留职费”、供两个女儿上大学并赴日、美留学外，还积累了一些资金。后来由于国际市场的变化，不得不另谋出路，但通过辛勤实践，使李劲祥和曹素荣学会了经商办企业的宝贵经验。为了提高自身素质，55岁的李劲祥决心要学习新的经济知识，他们砸锅卖铁，挤出全部积蓄，决心自费攻读美国伊利诺大学高级经济人才管理系，获得学位之后在市场经济大潮里大干一场。

海内外亲友对李劲祥夫妻的身世和毅力深为感动，纷纷解囊相助，为他俩凑足1000万元注册资金，于1993年创办了北京华世通实业公司。几年来，惨淡经营，只轿车一项即购销四千余辆，为国家缴税达2亿多元，个人也获得可观的收益。

鞠躬尽瘁

有了钱不忘为国为民的初衷。李劲祥把企业交给女儿去经营，他夫妇则全力投入化经济效益为社会效益的活动。他从小最痛恨两种人：一是贪官污吏，二是汉奸卖国贼。他认为当前越演越烈的官场腐败和分裂祖国的台独势力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忧患。

1990年他主编了由薄一波同志题写书名、康克清老大姐和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吕枫等十多位省部级领导做顾问的《党政干部廉政读本》，从腐败现状、危害、历史根源和对策等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鸣。头版二万册很快抢购一空。自1998年至2002年7月，他又与人合作参与编著出版了《中国史记故事丛书》、《共和国往事》、《影响中国历史100人》、《论企业文化》、《统战系列丛书》等书共约六百多万字。还与一家工艺品公司合作，耗资1400多万元，制作50幅长70米的由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作序的《红楼梦》故事玉雕镶嵌连环屏到各地义展，博得广大观众，包括全国人大、政协、人民日报社等数十个单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

价，“对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开展，将起到积极作用”。多年来李劲祥夫妇省吃俭用，拿出800余万元捐助社会福利、发展科教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目前他受聘担任欧美同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全球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后援团主席、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社顾问等十几项社会职务。新华社、《人民日报》及海外报刊等多家媒体多方报导。

通过近、现代史和党史的研究，李劲祥认识到国、共两党的关系对中华民族的盛衰至关重要。“合则共兴，分则两伤”。国共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的伟大胜利；国共第二次合作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如能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几代爱国志士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的愿望必将成为现实。于是他利用各种海内外社会关系，为改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而牵线搭桥，并发表了《中国实现统一的必然趋势》、《血浓于水——海峡两岸关系形成与发展》等多篇论文，受到蒋纬国先生的赞赏，并亲笔为他题赠“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条幅。随着台独势力日益猖獗，特别是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主政以来，分裂祖国的阴谋变本加厉。李劲祥夫妇心急如焚。他们不顾年逾花甲，重病在身，长年累月，风尘仆仆地到世界各地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忘我地奔走呼号。有人问：“你们历尽坎坷，老了也应享点清福，何必拿自己的血汗钱去管国家的事情呢？”李劲祥郑重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不和平统一，我死不瞑目。”老战友送他一首不成格律的诗：

投笔从戎五十年，青髻斑发一瞬间。滔滔大圳歼顽寇，茫茫洞庭觅宝蚬。功罪自有千夫论，肝胆岂无一片丹。华夏一统升平日，与君解甲共归田。

（注：本文部分内容取自原湖南省经委代主任陈尤然的回忆录《南下纪实》“我的挚友李劲祥”）

吕振羽与家乡

彭扬文

吕振羽同志(1900—1980)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革命家和教育家。他读书为民，革命为民，研史为民，教育为民，他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的人。

吕振羽同志少年在家，时间短暂，青年在外读书期间及参加革命以后，与家乡的交往活动也极其有限。但就是这短暂而极其有限的活动却在人们的脑海里深深地刻印着他一心为民的光辉形象。

一

他的少年时代活跃在樵牧队里，目睹当时“种菜之人无菜吃，人面更比菜叶黄，黄金粒粒何所处，种田人家多缺粮”的黑暗现实，他愤愤不平，立志刻苦读书，将来当一名清官，救穷人于水火。一次，一穷人家的孩子偷了他家的东西，被家里人绑住，深夜，吕振羽悄悄地把他放了，并送他回家。吕振羽曾在本村进步塾师吕金翅的经馆读书，后到县立武东、武冈中学读书，通过接触进步教师、进步人士和进步书刊，开阔了视野，初步了解到近代经济落后、国难民辱的中国现状，萌发了工业救国富民的思想。中学毕业后便选入湖南工业专科学校（现湖南大学前身）电机系学习。通过大学几年的学习和了解社会，接触进步青年领袖夏明翰、李达等，始知中国当时第一位的事情乃是只有推翻旧政权，方可救国富民。于是，他大学毕业后便投笔从戎，参

加北伐战争，迈上了解放民众的革命道路。

在中学和大学求学期间，吕振羽十分节俭，但非常同情和关心贫苦同学和农友，一有机会就会帮助他们。在塘田武东中学读书时的一个冬天，他回家时在渡口发现一老农衣着单薄，冻得哆嗦，便将自己的棉衣脱给老人穿上，老人问他怎么办？他说我年轻，快步回家，不会冷的。他身着单衣，冒着寒风一口气走了20多里。他在武冈县城上中学时，离家有100多里乡路，步行往返不易，加之从事学生运动，因此很少回家。每学期所需钱粮由家里人送到学校，但经常写信回家催追钱粮。吕振羽的曾祖父辈是佃农，祖父辈、父辈才逐步成为小康人家，但仍过着清贫生活。家父发现他吃用超乎平常，久而久之，便怀疑他在学校胡乱花费，经反复询问，他仍不肯说出实情。父亲便“家法”从事，振羽才如实“交待”了接济贫困学友之事。此后，通情达理的父母便顺其心志。

到了大学读书时，吕振羽明白的道理更多了。他经常说服家里人，要少收或不收佃农租金，特别是天灾年份，应免收租谷，应将余粮借给缺粮农友度荒，不收利息。因而他的一家在附近乡村享有美誉。1937年，吕氏三修族谱传记篇中是这样记载他祖父母的：

“……鸿章公讳德良……家本贫农，赖辛勤节俭，卒成小康，……。公惜性慈祥，囊急贫弱，尤热心公益，以故，地方大小纠纷，府县每解不能决者，常凭公一言以为解。年近七十，犹鼓其垂暮之年……妇孺共誉，毫无间言，被称为一乡之良善公正。……，陈太夫人努力操作且助农耕，不惜售首饰助家用，贫农生活得以稍裕。……以富农女子来归贫农，生活之艰苦，家事之累荷，毫无怨色，家小康后，亦迄未变易其辛勤节俭之生活。暮年，尤自甘操劳，性复娴静，于妯娌邻里间从无兽声愠声，被誉为——乡母型。”

为了实现让民众温饱富裕的理想，在湖南大学读书的吕振羽还会集合武冈东四区的同乡学友，于寒假期间在家乡金称市古峰学校召开民众大会，成立清算委员会，要清理学校帐目和区团防局的税征田赋去向，宣称要建立一个没有统治，没有剥削，人人有田种，人人有事做，衣食温饱的“极乐国”。可惜不几日，他们的言行就被反动的地方政府发觉了，派兵四处捉拿吕振羽，于是他便在大年三十出逃。此足以说明其青年时代一心为民的志向和决心。

二

1936年，吕振羽兄弟二人已是国内的高级人才，吕振羽的公开身份是教授，吕持平（1902—1983）是民国政府的高级军械工程师、处长，特别是在边远的家乡山村，声名更是显赫有加。这年正逢其母亲60大寿、父亲58岁寿辰，按家庭实际，吕家当时人丁兴旺，却只有祖父留下的一座土木瓦房，不足100平方米的普通民居，完全可以借机大兴土木，修葺庭院。按传统习俗，大操大办，广宴亲朋，以光宗耀祖也不为过。可是吕振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荣耀和亲属的颜面，而是穷苦乡亲 and 广大民众。他与兄妹等人商量，停开觥庆，把积蓄为民众在家乡修了一座凉亭，“备迷途之问讯，供过客以茶汤”，以此来纪念先人，为父母祝寿。吕振羽的房后原是一条通往武冈的石板乡道，再往北走一里多路，便是山野田地，周围民众劳作和商旅过往无处避风雨，饮茶汤，解迷途。于是吕振羽兄妹等趁为父母祝寿之际，就在此山岗道边置地三亩六分、油茶林一片，修亭一座，取名“留念亭”。此亭乃是亭房合一的建筑，前为亭后为房。如此置地建亭在当地为数甚少，何也？吕振羽在“留念亭”碑记上写道：

“一九三六年寅历七月望六日，为吾母陈太夫人耳顺寿辰；三月念一日，为吾父梦求先生五十八寿辰。振羽持平仰奉慈意，

停开舫庆，建此亭以为纪念，并便行旅。复于亭近置地三斗六升（即三亩六分）、土一块、茶山一块，招致居停，备迷途之问讯，供过客以茶汤。义非同于生祠，意实符于大众，……”

此亭修成后，吕家将它送给族上管理，居亭者种地育林，烧茶汤，解迷途，均为无偿和自愿。亭两端石门架上，刻有原民国政府主席林森亲笔所题“留念亭”和两副对联：

“留是有年常怀亲恩耿耿 念非一日勉尽子道殷殷。”

“歇地获安闲勿谓此地非佳境；凉亭解渴热能许当途是休征。”

关于林森题字，其来历是这样的：吕振羽胞弟持平之妻江淑琛是林森之义女，江父与林森为至交，临终时托林森将其幼女淑琛抚养成人，并送读书，尔后给碗饭吃。于是江淑琛大学毕业后留在林森的身边工作。江淑琛见持平才华出众，留学欧美多国，知识渊博，人品忠诚，便嫁于了他。修亭之善举江淑琛也极力主张，便主动请林森题“留念亭”三字。吕振羽精通我党统战之政策，又适逢他参加南京谈判之后，此种统战活动之良机何乐而不为（吕持平 1948 年与我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奔赴解放区）。

未曾料想，在“文革”那特殊年代，此事便成了吕振羽的罪行之一。当地一极左思潮的教师，带领年幼无知的学生，抬着“刘邓黑干将”吕振羽的“黑书”，两次到此“破四旧”“毁黑帮文字”，夷平亭宇，推倒石碑，敲砸石刻文字，使亭只剩两端石亭门架（现碑尚存，个别文字不清，当地民众已移至吕振羽故居内保存）。亭有何罪？修亭之人何罪？碑文可以作证，对联可以作证，当地民众怀念吕振羽一心为民的感情可以作证。现在，改革开放政策使当地民众逐渐地富起来了，人们每每经过亭之遗址，无不怀念吕振羽兄妹，无不议论复修“留念亭”之事，可惜修亭人早已离我们而去了。

三

吕振羽兄弟中还有一位堂弟叫吕振簧（1903—1930），他们三人从小立志为民服务，把民众的利益看得高于兄弟情谊，高于一切。青年时代三人同在长沙求学。1925年吕振簧只身赴羊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东征”和“北伐战争”；“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厦门监狱。1930年3月，陶铸等组织劫狱，将他和4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救出，派往苏北根据地。同年5月，吕振簧在与敌战斗中牺牲。1937年3月，吕振羽从广州返京时取道回家乡三日，正值吕氏修族谱，应约便给吕振簧写了一传略云：

“君名振簧，字光吾，为吾伯父舜卿先生长子。幼岁随余负笈省垣攻读，最勤性忠诚，复有古所谓侠义气，同学友朋咸称誉之。后考入湖南群治大学政治系肄业。民十三（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解（改）组国民党，为培植革命干部，设中央军官学校于广东黄埔，招收全国有志青年，君只身间关赴羊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旋因病改入第五期步兵科。1926年，余任职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当时国共内争最烈，余前任之倪某对工人运动颇多摧残，一时羊城传述‘党代表摧残工人运动’。君误为继任之，写来信曾有‘吾兄弟献身革命，便当为占民众最大多数之农工而奋斗，如兄另有图谋，恐兄弟感情亦无可维系矣。’慷慨热情于此可见。……民十九，兰封之役，卒以勇猛过度阵亡，距升代营长才三日耳。忆兰封战前一月，君犹缄余，非难内战……余复函恐君尚未及见，孰意竟成永诀！余之感痛为何如耶？……”

从吕振羽1937年回忆吕振簧的赞美之词中不难看出他们献身革命，为的是占民众大多数的农工，舍此，兄弟感情都不可维系。对于维护民众利益，其志之坚，其情之深，可见一斑。

四

1937年9月，吕振羽开始在长沙筹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6月武汉失守后，我党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派吕振羽到家乡创办了“塘田战时讲学院”（简称塘院）。在办院期间，吕振羽认真执行我党的统战政策，充分利用国民党高层内部有识之士和当地开明乡绅做掩护，在学校努力培养中高级军政人才的同时，仍不忘宣传、教育和武装民众，保护民众利益。他们组织戏剧团、歌咏团、访问团、民众教育部等，深入到周边县、乡、村访问演出和办识字班。学院办得有声有色，被国民党惊呼为“南方抗大”。据当地夜校学员和老人们回忆，学院师生们毫不脱离民众，不要民众一针一线。到乡村演出和教民众识字时，民众将自己种的甘蔗、花生等土特产给他们，硬是不受。吕振羽以身作则，经常与师生们一起深入下去。寒冬的一夜，他到院后夜校识字班去察看时，发现一名叫周仪平的十二岁孩子衣裤单薄且光着红肿的双脚在读书，便马上回去取来一双布鞋给他穿上。至今，周仪平一提及吕老便感动得热泪盈眶。因此老百姓把“塘院”师生看作他们家庭中的一员。当时国民党的《抗战日报》于1939年2月刊登塘院一学生的一篇题为《我们生活在民众中》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我们才幸福哩！因为我们真正生活在老百姓的中间。

我们一出学校，便碰着那土头土脑，背起锄头，缠着腰带的老百姓，他们只会很亲善的望着你笑，或干脆一动也不动站着，注视你的衣襟，不然就张开大口喊你一句‘先生’，很难——简直可说不会遇到‘早安’、‘你好’、‘我好’之类的所谓交际语。常来碰，碰熟了，在校内可以经常碰到，尤其是倘若你到他们家里去进行访问的时候，他们会请你吃混浊的茶、自己田里出的甘蔗和花生，吃饭，喝酒，而且你是非吃不得。他们还使自己的儿

女们叫我们叔叔、哥哥、姑姑、姐姐，实际上已经把我们看作他们家庭中の一员了。”

从这篇短文中不难看出，当时吕振羽在塘院实行的一系列为民举措是何等的得民心，顺民意，受民爱，在进步、爱国、抗战的年青师生中是何等的受拥戴。

吕振羽同志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早日拨开乌云，让民众见到太阳。1939年3月，吕振羽偕“塘院”教师张天翼、李仲融、林居先等到20里外去了解民情，顺便登上当地名胜“阳乌岭”一游，四人兴起，便倡联诗一首：（吕）阳光暖国运，（张）乌气冷人心，（李）驱散九重雾，（林）现出五角星。联诗后，并提笔书于壁上。从此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吕振羽等忧国忧民，急于救国家民众出水火的迫切心情和必胜信念。

1939年4月底，国民党从三路派兵包围“塘院”，实行武力解散，贴出布告称“如有抗拒情事，准予格杀勿论”。学院在组织人员疏散时，周围群众自动放下农忙活计，含着眼泪帮助师生转移文件、书刊和撤离。吕振羽在最后一批撤出，为防不测，他从院后破窗而出，与一农友换了衣服，化装成挑大粪的，躲过了敌官兵，奔至后山，与王时珍（江明）、游宇、阎丁南等会合，转移到距“塘院”不足十里的油塘村，隐蔽下来，并在村内李氏宗祠秘密举办了为期十天的建党培训班。随后，培训班的骨干们分别在油塘、新宁、绥宁、城步、竹篙塘（昔属武冈，今属洞口县）建立了直属中共湖南省委的五个地下支部。油塘的金称市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就是王时珍（江明）。试想，如果吕振羽等“塘院”师生不和民众打成一片，为民众办好事，民众会保护他们吗？老百姓会怀念他们吗？

“塘院”被国民党武力解散以后不久，吕振羽、王时珍奉周恩来之命到重庆，从事党的理论战线、历史研究和统战等工作。“皖南事变”后，被派往苏北根据地从事党校工作，后任刘少奇